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专题引介：比较经学与《大乘起信论》 [Introduction to the Theme: Comparative Scripture and The Awakening of Faith Sutra]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u, Chengyou
Publisher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Scripture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04 22:09:4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785

专题引介：比较经学与《大乘起信论》

Introduction to the Theme: Comparative Scripture and *The Awakening of Faith Sutra*

佛教进入中国与儒学相遇，进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化佛教，是人类宗教对话的一个经典范例。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两个基本事实意味深长。一是佛教一开始传入中国内地，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齐头并进，但佛教在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后，大乘佛教变成了一枝独秀；二是在中国接受大乘佛教的过程中，印度大乘佛教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观、唯识并没有发扬光大，反而是印度大乘佛教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的如来藏思想在中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原因何在？

《大乘起信论》正是如来藏思想系统的一部经典文献。但其出处如何，一直众说纷纭。它的中文译本，最早出现在六世纪中期的中国，然而翻译它的具体年份、译者、作者尚存争议。六世纪末开始，佛教界就不断有人为之作注作疏，特别是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的一些宗师级的人物投入到这一行动中，致使《大乘起信论》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大乘起信论》中对中国化佛教宗派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奠基性作用。

进入 20 世纪之后，《大乘起信论》又引发了中日佛学界、佛教界的极大争议。在这场争论中，既有围绕著作权的作者之争，

也有围绕《大乘起信论》核心是否纯正佛法的义理之争。但这些争论，都无法回避《大乘起信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核心立场，以及“一心开二门”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固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尽管学术界对六朝社会儒家经学还缺乏精细的研究，但儒家经学在六朝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确是毋庸置疑的。考虑到这些儒家经典在当时社会中的巨大影响，以及当时文化教育的内容与形式，《礼记》、《孟子》、《易传》、《论语》、《孝经》等典籍中体现出来的仁爱思想及其思维方式，就应该成为知识界“一般的知识与信仰”（葛兆光语）。作为当时社会“一般的知识与信仰”，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外来文明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

因此，围绕着《大乘起信论》的各种争论，依然问题多多。为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在2013年初举办“比较经学与《大乘起信论》”国际学术小型研讨会。每篇论文都经过了与会者的充分研讨，形成了这一辑《比较经学》期刊的主要论文，它们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首先，关于《大乘起信论》产生的问题。韩国金刚大学校佛教文化研究所的石吉岩教授发表了《有关起信论成立的几点问题》。他在论文中主要探讨了与《起信论》的成立相关联的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起信论》中的“众生心”？此前一般是将其理解为如来藏缘起说，但本文在说明此种理解所存在的问题后，探讨了将“众生心”解释为瑜伽行派的“三性说”的可能性。第二，作者提出《起信论》原文中完全没有使用“佛性”、所用“阿梨耶识”概念中的执着意义、对于“如来藏”的不同表述方式等《起信论》中的“用语的特征”。第三，通过一系列的探讨，

论文主张《起信论》与《楞伽经》在思想上是不一致的。由此，论文探讨了《起信论》传入并由真谛翻译的可能性。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雪松副教授发表了《从民众信仰角度探究〈大乘起信论〉流行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影响》。他认为，《大乘起信论》与《占察善恶业报经》在流行时间、传播地域与具体内容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故论文选取《占察善恶业报经》为切入点，力图在南北朝后期末法信仰的时代背景下，从民众信仰角度重新认识《大乘起信论》。

其次，关于《大乘起信论》相关的注疏问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岡本一平教授发表了论文《净影寺慧远〈大乘起信论义疏〉的成立问题》。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考证净影寺慧远的《大乘起信论义疏》撰写时间问题。现传慧远的《大乘起信论义疏》是否为其本人所撰尚存争议，该文考证了《大乘起信论义疏》与慧远的其他著作的写作先后顺序问题。论文主要从“乘”、“起信”、“行位”、“三种三观”、“第九识”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断定《大乘起信论义疏》的撰写是在慧远的其他所有著作完成之后，而且《大乘起信论义疏》有可能不是慧远的著作。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文良教授发表了《澄观与〈大乘起信论〉》一文。他认为，澄观将《大乘起信论》和《华严经》皆视为“法性宗”的典籍，大量引用《大乘起信论》之文阐释《华严经》之义，其融通《大乘起信论》构筑“圆教”的意图相当明显。但在澄观的判教体系中，《大乘起信论》属于“大乘终教”，低于《华严经》所代表的“圆教”。澄观之所以作如此判定，是因为他认为《大乘起信论》虽然所讲的道理是圆满的，但这种道理与修行还没有达成一体，还属于“凡夫”的境界而非佛的境界。由于受到《涅槃经》的“佛性”论的影响，澄观重视“法性”与“佛性”之间的差异，这导致了澄观的《大乘起信论》观与法藏的立场不同。韩国金刚大学

校佛教文化研究所的金天鹤教授发表了论文《日本古代華嚴宗における〈起信論〉及びその註釈書の受容》。它旨在通过《起信论》和古代日本华严宗关于《起信论》的注疏来阐明日本华严宗如何看待《起信论》和法藏《起信论义记》的发展过程。日本华严宗对于《起信论》的重视一直从江户时代持续到了现代。

最后，关于《大乘起信论》的义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周贵华研究员在《〈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说——与唯识学相关义的一个比较》一文中主张，“一心二门”是《大乘起信论》的核心学说，由于其与唯识思想具有明显的关联，历来对其与唯识学的关系有种种解读，论文试图通过与完整唯识学（有为依唯识思想和无为依唯识思想）相关义的比较，对其给出一些新解读，以显示《大乘起信论》与唯识学间具有基本的一致性。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刘成有教授发表了《现代中国的〈起信〉义诤与“比较经学”》的论文。他认为《大乘起信论》对中国化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奠基性作用。论文基于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界的三大领袖级人物——熊十力、吕澂、印顺，围绕《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核心及其历史影响所引发的激烈思想争辩，讨论了熊十力、吕澂、印顺三人虽然共同面对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基于共同的现实关切，却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思想立场。立场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理论成果的深度。论文从经典阅读和经文辨读的“比较经学”的学术视野，分析了这场《起信》义诤对于当代文明对话独特的启发价值。

此外，本文集还收录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安德烈·凡·德·布拉克的论文《艾克哈特与〈大乘起信论〉：佛性的持续自我启示》一文，从比较经学的视野以佛解耶。在他看来，艾克哈特

的神秘主义的目的在于实现存在的持续自我启示，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点，他比喻这是上帝之子在灵魂中的持续降生。这可以与《大乘起信论》所区分的“本觉”（即一直在场的原初觉醒）与“始觉”（即原初觉醒的不断实现的过程）相比较。对那样的一个神秘主义的实现来说，“不断遗忘自我”的实践至关重要，因为这样才能为就在眼前的真理的持续在场留出空间。在布拉克看来，这样的一种比较研究需要一种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也许，这种以佛解耶的比较经学可以为“亚洲的基督教”提供某种特殊的路径。

总之，宗教（文明）间对话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某种意义而言，对话的实质就是不同宗教传统的自我诠释与相互诠释。在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学占据基础地位的汉唐时期，《大乘起信论》思想的传播、发展，与经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这样的视野来研究《大乘起信论》的种种问题，对于揭示佛儒对话中所体现出来的“文明对话的中国经验”，将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央民族大学 刘成有

